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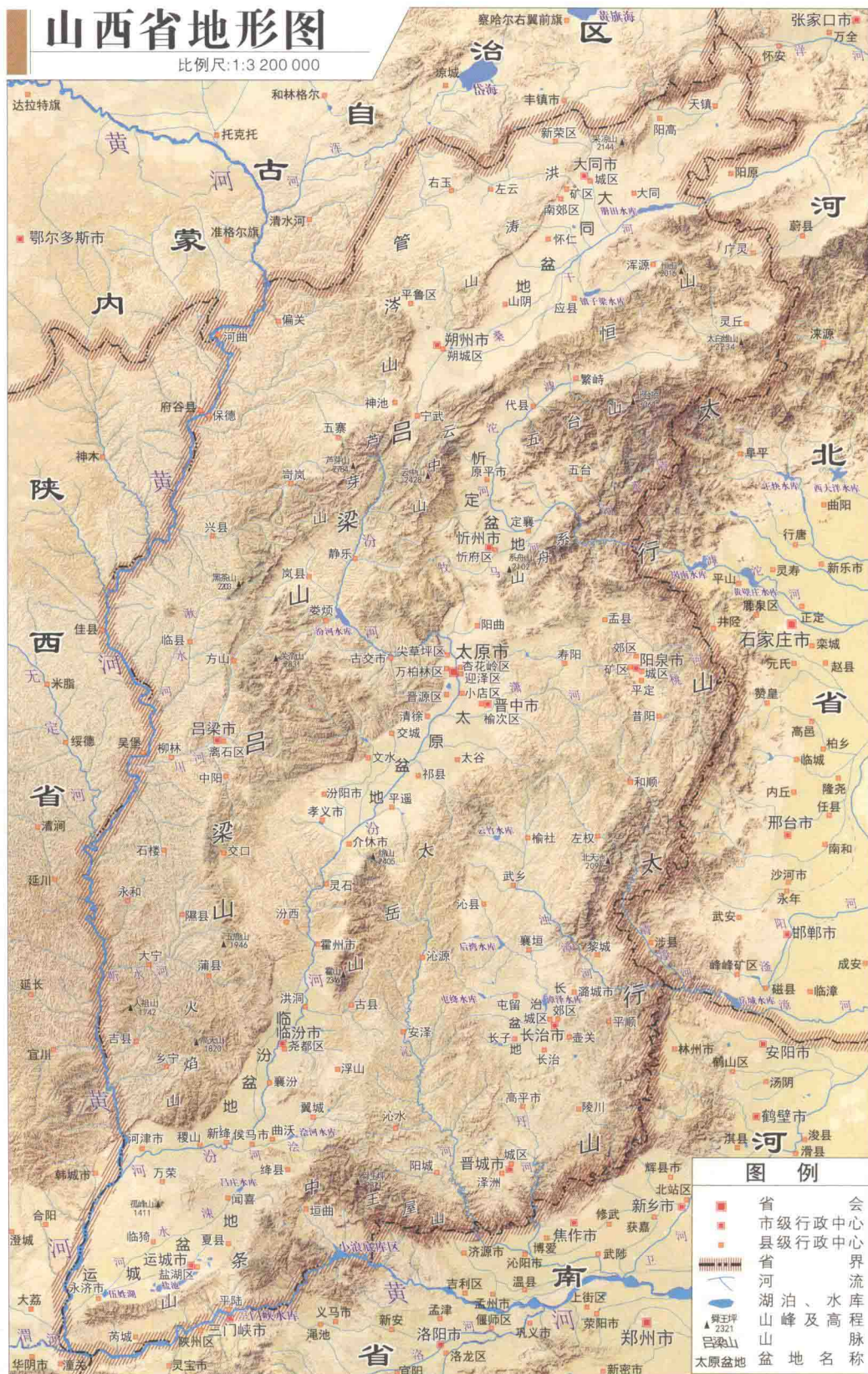
山西省政区交通图

比例尺:1:3 200 000



山西省地形图

比例尺:1:3 200 000



图例

- 省会
- 地级行政中心
- 县级行政中心
- 省界
- 河流
- 湖泊、水库
- 山峰及高程
- 山脉
- 太原盆地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自从人类出现以来，战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国家这一主权形态产生以后，战争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国家事务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为战争，也因此有了国防，有了边塞。边塞者，边疆设防之处也；风情者，风土人情之谓也。边塞风情这一文化品牌，特指山西作为历史久远且始终发挥着军事屏障作用的边塞要地，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诸方面产生的重大文化影响，在民风民俗、居家生活中保留的文化余韵，在文物遗迹方面存留的文化遗产及其文化价值。那么，为什么是山西而不是别的地区堪称边塞而成为边塞文化的体现者和传承者呢？

首先，这是由山西所处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不同文明的发生，绝不会凭空而来，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因素之一就是地理区位和气候条件。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对峙对立的两大文明，也即中原农耕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在地理上的重要边际线，是我国的 400 毫米年等降水量线。此线以东以南地区，是受太平洋及印度洋季风影响的湿润



“边塞风情” 文化遗存分布

比例尺:1:3 200 000



地区，适宜于农业发展；而此线以西以北地区，则为干旱、半干旱地区，占压倒优势的是游牧经济。这是两大文明生成以及区隔的前提条件。而 400 毫米年等降水量线又大致是沿大兴安岭—张家口—兰州—拉萨—喜马拉雅山一线划分的。从地图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条边际线恰好划过山西的北部地区，横穿大同、朔州两市而过。也因此，山西的北方地区成为两大文明斗争交融的核心地带。

从考古发现和有关的文献记载可知，先秦时期的山西其实是处于两大文明的共同支配之下的。比如古籍中记载的一支游牧民族鬼方，就长期活跃在山西的吕梁山区一带。吕梁市石楼、柳林等地出土的晚商时期青铜器，其文化特征便与中原文化明显不同，更多呈



现出游牧民族创造的鄂尔多斯青铜器的文化特征。据专家考证，这些青铜器物正是鬼方民族的文化遗存。实际上一直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强大的游牧民族如楼烦、北戎、北唐戎、狐氏大戎等仍然占据着山西省霍山以北的广阔区域。甚至在晋西南一些农业已经相对发达的地区，也具备着适宜于游牧民族生存繁衍的自然条件。春秋时的猗顿在猗氏一带（今运城临猗）依靠畜牧牛羊而致富，便是例证。一直到了战国中后期，赵国的赵武灵王变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修筑了赵长城，方将游牧民族的力量赶出了山西，并以长城为线将两大势力的边界确立了下来。

其次，这是由山西在历代政治格局中的战略地位所决定的。山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其文明的进程从未间断，影响深远。从《史记》中关于“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的记载来看，山西西南地区始终是华夏族活动的中心地带，是远古时期中华大地上最先进的文化舞台。当此之时，华夏族的先民们如何处理和与其毗邻的游牧民族的关系，已经不得而知了。夏商之后，山西渐渐失去在国家政权中众星拱北的中枢地位，政治统治的中心逐渐向中原、关中和京蓟迁移。然而，正是政权重心的游移，方显示出了山西“控带山河，踞天下之肩背”的重要地位。因为当中央政权处于关中、中原时，与山西都是一衣带水，仅隔一条黄河；中央政权处于京蓟时，与山西则隔一岭太行山，山西始终处于中央的肘腋或肩背的位置。这样，山西就成为横亘在游牧民族进犯中原通道上、屏卫中央政权的一道重要防线，受到了历代统治阶级、统治集团的特别关注。山西也因此被誉为“兵家必争之地”、“有国者

必争之地”。

山西被统治阶级有意识地设置为军事重镇应该始于西周初年。周人是从陕西渭水流域发展起来的，镐京是他们的根基之地，武王伐殷取得胜利后，他们又占领以洛邑为中心的广大中原地区。两个地区连在一起，就形成周王朝统治的中心区域，即所谓的“王畿千里”。为了保卫王畿，周初实行了“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分封政策，周武王的继任者周成王亲自把自己的弟弟叔虞分封到山西南部的古唐国旧地，其屏卫中央政权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而唐叔虞及他的后人们的确不负厚望，晋穆侯时，晋人曾会同王师夹击条戎、奔戎，与姜戎大战于千亩，败北戎于汾隰，有力地保卫了西周的安全。周幽王失国，又是晋文侯与郑武公拥立周平王开创了东周政权，所以周桓王说：“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周王朝以下的历代政权，无论是建都关中的秦、汉（西汉）、隋、唐，还是定都中原的汉（东汉）、魏（三国）、晋（西晋）、宋（北宋），乃至以北京为统治中心的元、明、清各朝，山西这种屏卫中央政权的作用都是非常之突出的。

其三，这是由山西独特的地理形胜决定的。山西之所以能够在历朝历代承担捍卫中央政权的重任，不仅在于它踞华北而倚西北、连蒙古地区而瞰中原以及与中央政权互为表里、互为依托的重要区位优势，更在于其“表里山河”的独特自然地理条件。山西地处黄土高原的东南边缘，“其东则太行为之屏障，其西则大河为之襟带。于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勾注、雁门为之内险。于南则首阳、底柱、析城、王屋诸山滨河而错峙”，从而形成了自为一体的封闭环境。其毗邻地区无论从哪个方位进入山西，均要经由天堑重塞；

而山西一旦把守住进出境内的关口或渡口，就自然形成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态势。换言之，外部力量攻入山西是极其困难的，而从山西进攻境外，只要集中力量选择其中一处要害突击则可以无往而不利。特别是相对于周边的河南、河北、陕西的关中而言，山西形同高阜，地势堪称高险。所谓“居高临下，势如破竹”，在过去依靠冷兵器一刀一枪打仗的时代，这是很占便宜的优势。古人评价说：“九州形胜，秦得百二，齐得十二，晋介二邦以称险阻”；明清之际的大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輿纪要》中也说道：“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是故天下之形势必取于山西也。”正是这种易守难攻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山西赢得了“襟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的美誉。可以说，谁据有山西，谁就占据了战略上的主动，山



固关长城

西因此成为历代兵家激烈角逐的军事重地。

山西不仅从外部看易守难攻，封闭险固，而且其内部环境也极富军事价值。在山西境内，各类地形发育充分，山地、高原、丘陵、台地、平原皆有分布，而尤以山地、丘陵为其主要地形，二者共占到总面积的 80% 左右，地形地貌从整体上看属于山地高原。但在千山万壑、崇板云崖之间，从晋东北的桑干河河谷、晋中的汾河河谷，一直到晋南的涑水河河谷地带，又依次分布着大同、忻定、太原、临汾、运城等五个袋形盆地。这五个盆地既各成单元，又互相衔接，共同构成一道天造地设、鬼斧神工斜贯省境 2000 里的巨大地峡，成为山西境内无可替代的南北交通大动脉和军事战略通道。各个盆地的衔接部位，无不地势险要，自成锁钥，自北而南依次分布着马市口、阳和关、雁门关、宁武关、忻口、石岭关、天门关、高壁关、羁关、蒲津关、风陵渡等天险重隘。此外，省境内其他各地的关隘要塞也星罗棋布，无处不有。据初步统计，山西境内见诸历史文献记载且至今犹有遗址存在的关津渡口至少有 130 余处之多，真可谓“雄关漫道真如铁”！从军事地理学的角度来看，山西的这种地形地貌，既有利于军队的运动和战备辎重的转输，又便于部队的腾挪隐蔽，极富回旋余地。正所谓攻守兼备，进退咸宜，特别是为以少胜多、以弱制强提供了可能，创造了条件。而这种军事地理上的优势也自然不会为历代的军事战略家们所忽略。即使是 20 世纪 30 年代，毛泽东主席仍然关注于此，曾明确提出要利用山西依山据险的战略优势，把山西建成北方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山西之所以能成为八路军三大主力师所在地及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三大根据地

比例尺:1:3 200 000



▲ 历代著名战事

的根本依托，与山西境内的地理环境优势不无关系。

其四，这也是由山西在历代军事斗争中的重要地位所决定的。边塞既然因国防而设，则边塞必然关联着战争；山西既然处于民族冲突交融的前沿地带，军事地位特殊，又关乎历代政权的存亡绝续，则山西境内发生的战争亦必不可少。著名学者顾祖禹在他的《读史方輿纪要》中曾对古代战争做过详细统计，清代之前全国发生的大小战例共计 6192 次之多。而在山西，自西周始而止于清初，共计发生了 771 次兵争，占到了全国总数的 12.5%。这里还没有统计清入主中原至鸦片战争前山西发生的 64 次战事、清末及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八年抗战烽火及解放战争时期发生在山西的大量战事。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山西境内的战例较别处为多的结论。山西的战事不仅数量多，而且往往规模更大、残酷性更强，并对交战双方力量对比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比如春秋战国时期两次最大规模的战争均发生于山西。一是历时 3 年（前 455 年至前 453 年）的晋国智、韩、赵、魏四卿晋阳之战，一是历时 4 年（前 263 至前 260 年）的秦赵长平之战。魏晋时期的学者皇甫谧评价说：“晋阳之围，悬釜而炊；长平之战，血流漂杵。”的确，这两次战争的历时之久、规模之大、战况之惨，都是同时期所仅见的。长平之战中，仅赵国的参战兵力即多达 45 万，而秦国更是“十五岁以上皆荷戟”，投入战争的兵力当不下百万。战争结束后，仅被秦兵坑杀的赵国降卒就多达 40 万。而且，这两场战争的影响也极其深远，前者直接导致了韩、赵、魏“三家分晋”的结局，使中国历史从春秋时代推进到战国时代；后者则基本消除了秦国统一六国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开启了中国古代

史上第一次大一统的序幕。可以说，这两场战争是改变了历史走向、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争。而此等类型的战事在山西也非仅此二次，山西在古代军事斗争史上的地位由此而可见。

再从发生在山西境内历次战争的性质来看，当然以中原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事为最多。从先秦古籍最早记载的商王朝与鬼方之间的战争开始以至于明清，在中原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的相互攻伐中，山西可以说是无役不与。即使不是战争的直接发生地，也经常充当战争资源的供给基地和战略纵深。其次是抵御外敌入侵的战争。如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即因受挫于山西的娘子关而告结束；而在持续八年的抗日战争中，山西为中国军民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做出的重大贡献，更是光耀史册，不可磨灭。而在山西，还有一种类型的战争也值得大书一笔，这就是发生在国家政权分裂、时局动荡时期的战争。在中国历史上，一旦天下大乱，割据蜂起，各种势力相互攻伐，战事频发，山西左右天下大势的作用就凸显了出来。魏晋南北朝时如此，五代十国时亦如此。特别是五代十国时期，50多年间走马灯般的5个小朝廷中，由山西走出最后入主中原的就有3个，而十国中的北汉，也是宋王朝最后一个消灭掉的割据政权。当此之时，山西无疑是各路豪雄争夺的焦点和决定王朝兴衰的平台。难怪宋太宗赵光义在最后消灭掉北汉政权后，深有感触地说：山西是“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

最后，这也是由山西在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及在对外交往中的重大作用所决定的。战争作为民族之间矛盾斗争的最高的、最极端的表现形式，并不是始终存在的，甚至也不是历史进程中的主流。

历史上，中原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和平相处的时期相对于战争时期而言其实要漫长得多，作为国防机器而设置的边塞，更多时候是处于备而不用的状态之中的。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战争的发生必须依赖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从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的角度而言，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经常的形势是游牧民族处于攻势而农耕民族处于守势，特殊的形势是中原民族相对强大时，主动出击，远征朔漠，以消除边患。而游牧民族进犯中原，也往往



得胜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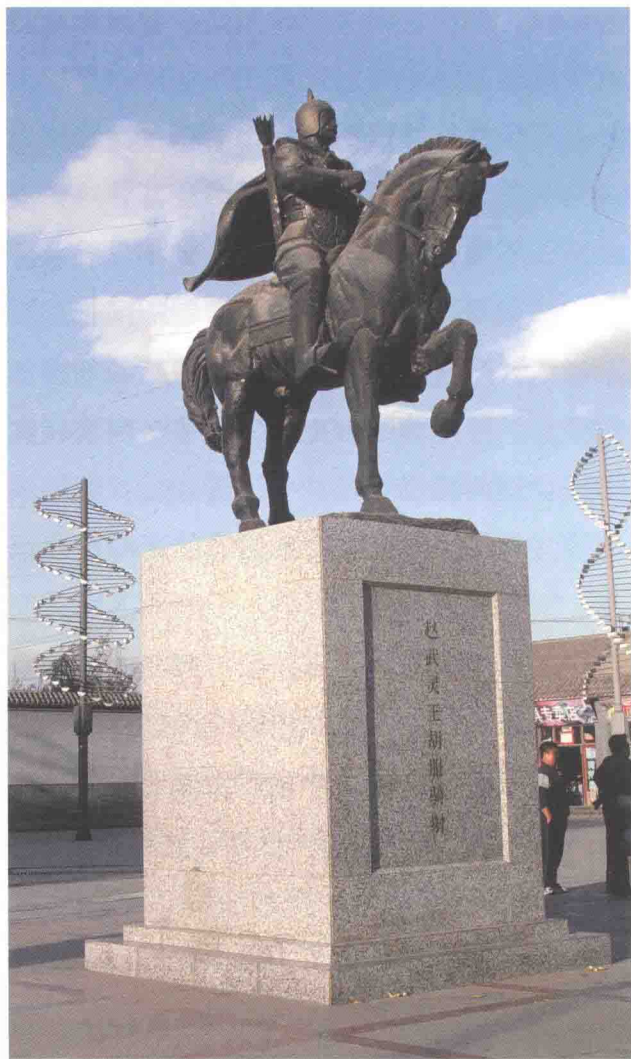
是在两种特殊背景下发生的。一是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气候等因素，生存条件遭受到严重破坏，游牧民族草枯水乏，原有的生产生活难以为继，饥饿使他们躁动起来，竞相南下劫掠；二是游牧民族出现了具有号召力的领袖人物，建立起了严密的社会—军事组织，他们会“以弓马之利取天下”，进一步把短暂的劫掠发展为大规模的征服战争。一般而言，当牧区水草丰茂的时候，游牧民族还是会满足于自己的草原生活的。战争前提条件的相对性决定了战争的相对性和和平的绝对性，也决定了不同民族在交往中融合交汇这一态势的绝对性。在和平时期，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会进行“茶马互市”——用自己的畜产品换取中原地区的粮食、布帛、茶叶和铁器。而这种交易发生的地点“榷场”，只能在农耕、游牧民族的边界线上。历史上大同的得胜堡地区、朔州的西口地区都曾是茶马互市的重要场所，为促进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做出过积极贡献。

和平固然有利于民族的交流和融合，而以暴力为代表的战争也未尝不是促进民族融合交汇的手段。我国历史上两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恰恰是发生在民族冲突和民族战争最激烈的时期。一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是宋与辽、金、元对峙的时期。而这两个时期民族间对立碰撞的主要区域，又都绕不开山西。由于战争的发生，一方面，造成了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北方游牧民族深入中原，中原农耕民族避难或被劫掠到北方，不同的民族智慧相融交汇，大大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进程。另一方面，战争促使不同的民族取长补短，“师彼长技以制彼”。游牧民族固然从农耕民族那里学习到先进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乃至改变生活习俗，而中原民族也未尝不从游牧民族那里

吸收到积极的精神或物质养料。如果说孝文帝改制是游牧民族师法汉民族的典范，那么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则是中原民族学习少数民族的生动案例。这种相互学习往往浸润到人格精神层次，史载山西“人性劲悍，习于戎马”，“并州近狄俗，尚武艺”，这种尚武、强悍、侠义的民风之所以形成，与游牧民族的影响不无关系。战争还导致另外一种结局，那就是“征服者为被征服者所同化”。历史上许多民族都曾在山西建立过自己的政权，如匈奴族的刘渊、羯族的石勒、鲜卑族的拓跋氏、沙陀族的李克用父子等，而现在这些民族已经湮灭无迹，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些民族经过长期的演进同化，已经融汇到当地的文化和民族之中，最后成就了与中原民族血统的合流。

山西地区作为边塞之地，也自然担当着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任。由于其北连蒙古地区、西通中亚的区位优势以及在数个历史时期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山西历史上在沟通连接东西方经济文化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自秦汉直到唐代中期，山西一直是我国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区域之一，在推动南亚次大陆佛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在促进中西亚宗教、艺术等文明成果与中华文明的交融等方面，都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到了明清之际，崛起于山西的晋商更以其“致利四海”的强大雄心，实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商业辉煌。他们经营的区域，北通俄罗斯，直达欧洲；东接日本、朝鲜；南下东南亚；往西也抵达了中亚、西亚诸国。驰骋商界500年的明清晋商，在加强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可谓一时无二。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山西特殊的自然地理位置、山西在



赵武灵王墓

历代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山西的自然地理形势以及山西在战争与和平这一曲民族交往合奏曲中发挥的巨大作用，都决定了山西是实至名归的边塞，从而也成为边塞文化的体现者和传承者。同时，我们还可以发现，山西作为边塞，作为边塞文化的体现者和传承者，具有这样几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完整性，包括了空间的完整性和作用的完整性。

从空间完整性上来

看，山西关河四塞，自成一体，在军事斗争中的价值十分重大。山西北部的大同、朔州、忻州固然是历代民族间争锋用兵的前哨，而西部、南部的黄河、东部的太行山也是阻挡外来势力进入的有力屏

障。即使是山西内部，众多的关塞隘口也有利于守御者步步为营、层层设防。可以说，山西处处可以找到兴兵用武之地，北方的外来势力突不破山西，就威胁不到中原、关中等京畿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把山西整体视为边塞。从作用的完整性上来说，山西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战争与融合两种交往形态中的作用同样明显。无论是金戈铁马、干戈扰攘的战争，还是势力平衡、和平相处的交流融合，都在这里留下了大量不可磨灭的历史陈迹，形成了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值得关注的文化图景。

二是长期性。山西之为边塞，是相对于中央政权的军事地位而言的。自西周王朝有意识地以山西来藩屏王室以来，由于中央政权所在地与山西在空间上唇齿相依的关系，山西便毫无疑问地充当着边塞的角色。秦、汉如此，晋、隋如此，唐、宋、明亦如此。个别例外的情况，有南宋偏安，宋、金以淮河、大散关为线相对峙的时期，有元朝、清朝两代，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海内一统”，国境线大为北移，民族间战争暂时平息的时期。但这种例外，是相对于斗争形态的例外，山西作为与游牧民族接壤的地带，在推进民族融合交流方面的作用始终是存在的。

三是典型性。一方面，相对于其他任何地区来说，像山西这样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先后与群狄、诸戎、匈奴、鲜卑、羯、氐、羌、突厥、回纥、吐谷浑、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民族进行过激烈的冲突和斗争，进行过大范围、深层次的交流与融合，可以说是不多见的，甚至是绝无仅有的。另一方面，作为边塞地区，山西也将其在军事斗争和民族融合方面的作用和影响发挥到了极致。从战争